

回

眸

刘皓宇 著

湘人书坊



刘皓宇 著

2008 年 6 月

写在前面

编辑在这本小册子里的，是我离休以后陆陆续续写的一些文章和诗歌。汇集成册也算留个纪念。其中有针对时弊有感而发的，有些是怀念故人的，有些是外出旅游回来作点记录的，还写了一点不成体统的打油诗，随兴之所至，信笔拈来，多数发表在“五柳村”网站上。人老了，退休闲居家中，有了一台电脑，也就利用它打字来写字作文，抒发内心的感受。龚育之同志在《学习时报》上写过一篇长文“是萎缩还是繁荣”，论述党史研究方面的种种问题，内中谈到自费印刷物，他说：“现代排版印刷的条件比过去方便多了，社会的财富状况也比过去优越多了，所以古代有钱人自费刻书的传统，今天普通人也可以做到。有些书，出版社不出，人们就自费印出，分送友人……人人不出我书，我书自有出处。”我把自己的这些短文印成小书，分送友人，也就是响应他自费印书的倡议，履行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的权利吧！

在这些文章里，谬误一定是很多的，印出来征求意见，也算是敝帚自珍，抛砖引玉，尚祈多加指正。

刘皓宇于2008年六月

目 录

一、杂文

《论三峡工程》出版前后·····	(1)
从对立统一规律想到政治体制改革·····	(7)
丽江古城的启示·····	(15)
帽子问题·····	(18)
语录考·····	(27)
拯救麻木的灵魂·····	(34)
从“人民公社大食堂”店名引起的联想·····	(38)
建议用公民课取代政治课·····	(41)
警惕对人民的异化·····	(46)
期待新闻出版立法·····	(50)
1957:新湖南报人编后·····	(55)
一句骂语引起的思·····	(59)
电脑“老玩童”·····	(62)
从东亚病夫到体育强国·····	(67)
朋友陈君的一席话·····	(70)

二、游记

旅韩见闻杂记·····	(73)
贵州纪行·····	(93)
游珠海鳄鱼岛公园·····	(104)

难忘的陕西行·····(108)

西北印象记·····(120)

三、怀念

怀念千家驹先生·····(134)

令人唏嘘痛失君·····(139)

永别了,俞润泉同志·····(144)

送柏先前行·····(147)

怀念钟哥·····(150)

四、祝寿

给朱九思同志祝九十大寿·····(153)

祝九思同志九十大寿(诗)·····(159)

壮心不已,老而弥坚·····(161)

五、书评

一部失去双臂的人用口咬笔写成的血泪史·····(164)

人生处世的教科书·····(185)

请读六十五年前毛泽东的一篇讲话·····(192)

给茆家升同志的信·····(201)

六、纪事

一个被遗忘的人·····(203)

咫尺天涯·····(210)

杨小凯和他的《牛鬼蛇神录》·····(234)

杂文：

《论三峡工程》出版的前前后后

今年是李锐同志八十八岁寿诞。在日本，八十八岁寿诞称为米寿，盖因正反八字再加十字合在一起便成为米字，故米寿由此得名。古人云：“人生七十古来稀。”现在随着科技的进步，人的寿命延长了，但要活到八十八岁也不容易。特别是李锐同志历经坎坷，而又一身正气，老而弥坚，就更不容易了。我们是他在湖南创办新湖南报之初所办的新华社湖南分社、新湖南报新闻干部训练班的学员，他是我们的革命引路人，在他米寿寿庆之际，我禁不住遥望北国，深深地祝愿他老健康长寿，越活越年轻！

李锐同志的重大贡献之一，是在三峡工程问题上。他对工程上马一直是持反对态度的。他力主慎上缓上，坚持科学论证。我曾经是他的著作《论三峡工程》的责任编辑，因此，想专门谈谈这本书出版前前后后的一些事情，以及它的出版对国家建设和决策所起的巨大作用。

还在1984年下半年，我当时是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的编辑。一次，我的同学朱正从北京回到长沙，他带回一部书稿，对我说：“老社长李锐同志（因为李曾经是新湖南报的第一任社长，所以我们都这样亲热地称呼他）有一部论述三峡工程的书稿，想要出版。”我因对三峡工程不太熟悉，不知出版此书的效益如何，便向

他提问。朱说：“这是一项关系全国人民利益和幸福的大事，你看了书稿就会知道的。”我熟知李锐同志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而又刚正不阿、坚持真理的老革命，为说真话曾经受过多次打击，因此相信他的书稿一定是有价值的。我打开书稿细看，才知道三峡工程自从解放以来，在上马与慎上、快上与缓上方面长期存在两种对立的意见。正方以林一山为代表，认为兴建这一工程既能防洪，又能发电，解决能源不足的问题，有力地促进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一项世界级规模空前的工程，能给中华人民共和国能带来极好的声誉。但反方以李锐为代表，认为这么一个举世瞩目的巨型工程，它涉及国家的经济、政治、社会、科技、军事直到生态环境等等方面，影响深远，因而必须谨慎从事，周密分析，方能正确决策。原因很简单：第一、三峡工程耗资巨大，目前国家百废待举，经济条件暂不允许；兴建这一世界空前规模的工程，实非当务之急；第二、这一工程牵涉面广，如有一百多万移民要动迁；上游地区的水土保持要先搞好；水库泥砂沉积是个问题，对生态平衡会带来不利的影响，对水路交通的畅通也有一定影响，三峡附近的地质会因水库水位增高引发山体滑坡和地震；对周围的水质环境也将产生污染，对气候也会产生影响；建设这个特大工程，现有的科技条件能够否胜任也是个问题；即使发了电，还得解决高压远程输电和用电问题；还有，持上马论者认为建坝主要解决防洪问题，但根据洪水宜疏不宜堵的原则，这一工程能否解决长江中下游的防洪问题也是个未知数；最后它对国防带来什么不利影响也值得深思……等等，如果稍一考虑不周，就会造成无穷的后患与不可挽回的损失，后悔莫及。第三、在长江中下游建设这么大的工程，违反先上

游后下游，先支流后干流的水利建设原则，这是不合工程总体设计程序的，必然会带来料想不到的后患。第四、决不能就三峡论三峡，应该放在国家经济宏观决策的高度，即放在长江全流域综合治理；放在国家整个能源决策的总体上；放在全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总体上来系统论证，并且要发扬民主，听取多方不同的意见。第五、国外对于是依靠水电来开发能源，还是用别的办法如核电、风力发电、潮汐发电、地热发电、太阳能发电来开发能源，还存在不同的意见，因为水电的基建投资大，建设时间长，而到底能够利用多久仍难以估计。因此，对这一工程，在决策民主化与科学化原则指导下进行广泛论证，慎思明辩，很有必要。

我看了这些书稿，觉得文章言之成理，又是关系国计民生、子孙后代的重大课题，自己作为一个编辑，不应只是为编书而编书，还应该考虑在自己的岗位上为参与国家重大问题的决策尽一份力，因此应该力促书的早日面世。然而当时湖南“左”的思潮影响比较严重，有人说：“这与中央领导的提法不太一致，会不会说是未与党中央保持一致？”我想：过去自己被划为右派，就是因为没有紧跟省委某个负责人，未与报社领导保持一致，提出了自己的意见。现在是不是又会有人像过去那样给自己扣上“帽子”呢？我反复思量：李锐同志在南宁会议上敢于在毛泽东面前与林一山展开辩论，在国家建设问题上，为了追求真理，敢于冒风险，发表不同意见，我为什么竟不敢大胆负责呢？而且道理通过辩论也将愈辩愈明，使决策更加稳妥，这又有什么可顾虑的？于是我毅然接受了这个选题，理直气壮地担任了《论三峡工程》一书的责任编辑，且在封面设计上也听取了李锐同志的意见。

此书出版以后，在社会上的反响很大，许多读者纷纷来信求

购此书,但是令人不解的是,全国的报章却不让发表有关此书的评介文章。我向各大报纸投稿,都碰壁而回。只是由于李锐同志的介绍,才在内部刊物《能源政策研究》杂志 1986 年 1 月的第一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一本特大工程宏观决策问题的书——读〈论三峡工程〉》的书评。

但是,纸是包不住火的,《论三峡工程》像一块巨石,一石击起了千重浪。纵使权威禁止在报刊上发表反对上马的意见,但 1987 年《群言》杂志上,仍然发表了李锐《重大决策必须民主化、科学化》的答记者问,文中说:“五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初,关于三峡工程、长江防洪和水利工作,我发表过许多文章,也曾多次向中央领导上书,这已编辑在去年初出版的《论三峡工程》一书中。”“像三峡这样关系国计民生的巨型工程,不是哪个部门或地区的事,是全国人民的事;不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事,而是关系子孙万代的事。这样的大事本来是应该集思广益的,可是过去年代,主观自是,专断成风,巧言偏信,好大喜功,怎么能够谈得上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呢?”“最近万里同志在全国软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着重提出了决策民主化与科学化的问题,他说:‘今后任何重大问题的决策,不能再停留在凭领导者个人经验和意志办事的传统方法和水平上,而应采取科学方法,按照科学的程序,进行科学的论证,力求减少和避免可能出现的失误。’我认为,今后办好三峡工程的论证,得出正确决策的希望,也就在这里。”

随后,在 1987 年和 1989 年,国家计划委员会经济研究所原副所长田方与林发棠等同志陆续主编了《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与《再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两书,在湖南科技出版社出版,都由我担任责任编辑。这两本书广泛收集了全国专家、学者

对三峡工程的论述,分别介绍了社会的舆论、专家的总论、综合论述、专论、别论、外论以及对中国能源决策的探讨等。两书都由著名科学家周培源作序,孙越崎、黄万里、王淦昌、千家驹、侯学煜、周谷城、方宗岱、陆钦侃、何格高、茅于軾、罗西北、陈国阶等专家学者,纷纷著文主张缓上、慎上,这些宝贵意见的集中发表,便突破了过去关于三峡工程只有早上、快上意见一统天下的局面,大大促进了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的进程。后来,我又在《科技之窗》上写了《有力地推进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进程——评介〈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等三本书》的文章,指出:这三本书突破了对三峡工程由某一部门“自我论证”,扬“一家之言”的垄断局面。在舆论的强烈要求下,三峡工程快上、早上之风得以遏制。在1987年,政府领导人姚依林就公开宣布:缓建这一超世界水平的特大工程。《再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一书还赶在1989年人大、政协七届二次会议开会之前出版,并以最快的速度送到了人大、政协七届二次会议的会场上,这引起了代表们的高度重视,使得三峡工程成为两会的热门话题之一,……随后,出席人大会议的九个省二百七十多名代表联名向人大建议,要求把三峡工程推迟到二十一世纪去考虑。国内许多专家与学者在评论《论三峡工程》等三本书时,都指出:它的意义不只限于三峡工程本身,而且实践了宪法所规定的言论自由与出版自由,在推动我国重大问题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方面,带了一个好头,起到了有益的作用。可以说,这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还属破天荒头一次(后来戴晴又主编了《长江,长江》,《宏观决策》内部又出版了三论、四论)。而这些都是因李锐同志《论三峡工程》的出版带来的硕果,故李老是功不可没的。

现在三峡工程虽然正在施工建设中,有的机组已经发电,但

出现的问题仍然不少,不论今后的成败利钝如何,李锐同志的《论三峡工程》和以后的两本书及其他书,必将在中国三峡工程以及其他工程建设史上,占有一席重要的地位,它也为我国重大问题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李锐同志这种“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的精神,将照亮后代前进的道路,彪炳千秋。

如今,李锐同志已经进入耄耋之年,但他的思想的确与时俱进,站在时代的前列,我们只有以他为榜样,做一个追求民主、自由、敢于独立思考,爱国爱民的人,才不辜负他过去对我们的教诲。这也才是我们对他米寿寿诞最好的祝贺。

(2004年1月)

* * * * *

* * * * *

煤 之 歌

* 我来自大地的底层,亿万年间默默无闻, *

* 高温使我乌光发亮,重压叫我铁石坚贞。 *

* 我来自大地的底层,本由青枝绿叶变成, *

* 虽然不再葱茏繁茂,体内仍然活力无穷。 *

* 我来自大地的底层,力量聚集在沉睡中, *

* 一旦醒来奔向世界,胸中早已烈焰熊熊。 *

* 不在光热中化为灰烬,就在光热中求得永生, *

* 纵使重归地底,也将二氧化碳献给森林。 *

* 别看我满身漆黑、貌不惊人,灵魂可比冰雪还要晶莹, *

* 甘愿赴汤蹈火、粉身碎骨,为的让宇宙万物昌盛繁荣。 *

(1981年2月)

* * * * *

* * * * *

从对立统一规律想到 政治体制改革

马列主义哲学唯物辩证法中有一条规律,即对立统一规律。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根本规律。列宁说过:“辩证法本来就是研究对象本身矛盾的。(见列宁《哲学笔记》)”他还说:“发展就是对立面的斗争。(见《列宁全集》)”毛泽东说得更加具体,他说:“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任何事物内部都有这种矛盾性,因此引起了事物的运动和发展。事物内部的这种矛盾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因此,了解事物矛盾这一个法则,对于我们是非常重要的。(见《矛盾论》)”邓小平也说过:“党要受监督,党员要受监督……毛主席说,要唱对台戏,唱对台戏总比单干好。我们党是执政的党,威信很高,我们大量干部居于领导地位,……如果我们不受监督,不注意扩大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就一定要脱离群众,犯大错误。”(见《邓小平选集》第一卷 270 页)这些话都说明任何事物内部都存在矛盾,重要的是要利用这种矛盾来推动事物发展,否则就会成为阻碍事物发展的绊脚石,就要出问题,犯错误。我国古来的阴阳学说也指出:“孤阴则不生,独阳则不长。阴阳调和,万物育焉。”荀子形象地比喻说:“民水也,

君舟也。水以载舟，水以覆舟。”这些话中都包含着对立统一的深刻道理。所谓党要受监督，就意味着党要有其对立面来唱对台戏，唱对台戏也就是互相监督、互相制约。荀子说的君与民也是封建社会统一体中的两个对立面，他用水与舟来形象地描述了君、民两个对立面之间的关系，就是说，如果君王的政策符合人民的愿望要求，人民就拥戴他，相反，如果君王的政策不符合人民的愿望和要求，人民也就可能推翻他。孟子也有民贵君轻的说法。他还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这说明封建专制社会中的君与民，君与臣两方面，都是有着又统一又斗争的关系的。这种关系处理得好，社会就发展与稳定，历史也就是这样发展与前进的。

看看近代的蒋介石政权吧，它也不是一开始就腐朽、专制、独裁的。当北伐开始时，他举的是反对封建军阀的大旗，领导北伐军讨伐北洋军阀，自己曾经是北伐军的总司令。当时国共合作，共同战斗，朱德、叶挺、贺龙、彭德怀等都在北伐军中工作过。当时蒋介石与革命人民的矛盾并不大。共产党与国民党都在国民革命这一大前提下统一进行斗争，斗争的对象是北洋军阀。可是当革命进行到一定时期，他代表官僚地主阶级利益的本来面貌暴露出来，于是来了个四·一二清党，宁汉分裂以后，便反共反人民了。到了抗日时期，在抗日的大前提下，共产党号召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一定条件下，国民党与共产党又保持一定的合作关系，共同抗日，合作的斗争对象便是日本帝国主义。当日本投降以后，这个政权又日益暴露其反共反人民的面貌，便大打其内战，引来了三年人民解放战争，当时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贪污腐败，民心归向共产党，最后蒋介石政权不得不垮台，败退到

台湾。到了台湾之后，他吸取了失败的教训，说出了一句很深刻的话：“我不是被共产党打败了，而是自己打败了自己。”于是他重振旗鼓，励精图治，发展经济，救亡图存，经过几十年，台湾终成了“四小龙”之一。老蒋死了，小蒋（经国）上台，能适应社会潮流，在小蒋死之前，开放党禁报禁，允许台湾社会中存在不同的政党，也允许存在不同的政见，允许言论、结社、集会、游行的自由，于是台湾与大陆相反，开创了民主风气之先。这样，社会显出了生气，不但没有大乱，反而跟上了世界民主自由的潮流，以民主自由政治与大陆分庭抗礼。而这以后，国民党第一次由执政党变成了在野党。可国民党并没有亡党，目前又正集结力量企图东山再起，重新执政。所以，从近几十年来的历史看，正应验了《三国演义》中“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句古话的道理。这也是符合社会通过对立面又斗争又统一以求得发展的道理的。

如果我们明智一点的话，应该看到历史发展的规律：事物无不在一定的条件下走向自己的反面，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而社会发展变化的依据就是人民的利益、人心的向背。俗话说：“得民心者昌，逆民心者亡。”今天，共产党已经领导着全国十三亿人民，我们的国家已经处在二十一世纪之初，科学技术的发展几乎是一天等于二十年，假如我们真是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先进的文化，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的话，为什么不能想想：自己应该怎么来有意识地树立对立面，主动接受人民和其他政党的监督，来防止自己内部的变质腐败；更主动地运用对立统一规律去推动社会前进呢？刘少奇说过：“共产党除了人民的利益之外，别无自己的私利”。毛泽东说过：“共产党是不怕别人反对的，如果被反对倒了，活该。”因此只要真是以人民利益为重，抛弃一己私利的话，党就会像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安泰那样战无不胜，又怎么会怕

别人反对呢？今天，世界已经变成了地球村，民主、自由、人权已经成了席卷世界的潮流。台湾既然能够顺应世界潮流实行政治民主化现代化，那么我们为什么不也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学一学蒋经国顺应世界发展的潮流，实行民主宪政的政治，开放党禁报禁，允许国内政治实行多元化（我们已经承认在国际上应该实行多极化）呢？

有人说：“共产党的领导是绝对的，开放党禁，国家便会乱。”我们不否认共产党的领导权，但是这个领导权不是自封的，要建立在人民群众拥戴的基础上，正如“水以载舟”那样。邓小平说：“党要受监督。”哪个来监督呢？人民群众。但人民群众是分阶级，分为利益集团的，政党就是代表了不同阶级、不同利益集团的团体。共产党既然是靠着人民群众的拥护，才得以打倒蒋介石政权，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那么，建设现代化的民主中国更需要人民群众的拥护。共产党与人民群众应该是鱼与水的关系，哪有鱼害怕水的？所以，以人民利益为重的党绝不应该害怕人民群众中不同的政党与团体与自己竞争，古语说：“有容乃大，无欲则刚。”人民群众中的各种政党、团体，即使有各种各样的不同政见，也正可以俱收并蓄，利用他们来监督党与党员。如果党员中有人要做坏事，正是“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即使想干坏事，也不敢干，干了也会被大家拉到太阳光下，受到广大人民和法律应有的惩罚。这样的党岂不是更加健全，更加能够起到领导作用了吗？又怎么会损害党的领导呢？更怎么会乱呢？看看美国前总统克林顿，闹了那么大的丑闻，他的对立面共和党人对他攻击得那么厉害，美国的社会乱了吗？不但没乱，美国就是在这样众说纷纭的情况下，政局始终保持稳定的。别的国家多出现过政变和内战，美国自南北战争以后却从来没有出现过，这就足以为证。所

以怕不能领导，怕乱而不敢开放党禁的思想是不必要的。

有人说：“我们不是有多党合作，互相监督，长期共存吗？”看看建国以来的历史，在建国之初，民主党派还有不少人参加政府工作，有职有权，民革的李济深、民盟的张澜、章乃器、章伯钧、罗隆基，民建的黄炎培等都担任过政府要职，但曾几何时，这些人一个个都排除出政府之外，政府成了清一色的“党天下”。到了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民主人士凡提了不同意见的，都被打成右派；民盟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组织，所有民主党派经过这样制作以后，不仅不成其党派，没有什么政纲政见，且不管共产党提出的方针政策是否正确，他们都摇旗呐喊，高呼伟大光荣正确，其党派的实质已名存实亡（有人形容它们为花瓶、摆设）。因而在开政协会议时，民主党派的代表照例是完全拥护。一切方案都由共产党的政治局拟定，交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会议通过，这一切不过是走过场的形式而已，即便有人有不同的想法看法，也起不了什么作用（如三峡工程的通过）。试想这是什么多党合作，是什么互相监督？这合作只是个名，实则是“挂羊头卖狗肉”的一党专政。而一党专政并不是全体党员当家作主来专敌人的政，只是少数几个党的领导人一言九鼎，来为民作主，来决策大局罢了。这样，只搞一言堂，不搞群言堂，各阶层人民的积极性得不到发挥，又怎么能够真正推动社会前进呢？

有人说：“我们不是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吗？”宪法规定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但看看人民代表，是不是人民普选出来的，它代表人民履行了什么最高权力？我有个朋友，有一年成了全国人民代表，别人不知道他是怎么当了人民代表的，事先他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会当上人民代表，可当了一届以后，忽然不要他当人民代表了，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不要自己当人民代

表了(实则由领导圈定)。至于执行最高权力,则是口头上一句话。从没有看见人民代表大会哪一次否决过共产党领导人提出的哪次决策。实际上最高权力并不在人民代表大会,而在党中央,甚至是在中央的某个领导人。设想,如果人民代表大会真能起一点作用,那么“反右派”、“反右倾”“三面红旗”,“文化大革命”能够发生吗?中国会折腾得这么久,这么厉害吗?这个名为最高权力机关,实则连一点监督作用也不能起的人民代表大会还有什么用处?不过是一个假民主的摆设罢了。

有人说:“我们不是有民主集中制,既有民主又有集中吗?”所谓民主集中制的含义,是民主的基础上集中,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说穿了,民主只是个短暂的表面形式,它既没有制度、程序作保证,也不受法律的约束,集中起来的意见其民主程度如何,也没有谁来检查衡量;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则其民主是有限度的,是在领导意图决定下实行的民主,假如领导意图不要人民群众实行民主,那么民主随时可以废除掉。比如,1957年实行大鸣大放,这是毛泽东的领导意图要大家大鸣大放,应该说是有限度的民主,但几天以后,他说“事情正在起变化,鲨鱼浮到水面上来了,”鸣放成了猖狂进攻,于是原来短暂的民主没有了,整个社会掀起了猛烈的反右派斗争。原来说的言者无罪,变成言者有罪了。毛泽东更说:“民主是手段,不是目的。”意思是我要它使用它,不要它便可以不用它了。所以,民主集中制归根到底还是集中,也就是极权专制。

有人说:“我们不是在搞机构改革吗?”须知机构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是两码事。机构改革只是就行政机构的设置,人员的精简,机制的转换作一些适当的调整,这不是从根本上改革,而只是修修补补。如果说政治体制改革是大局,机构改革只能说是小